

张天佑 著

革命文化的寓言

——20世纪文学中的身体、死亡叙说

兰州大学出版社





■ 策划编辑/穆 敏

■ 责任编辑/张建芳

■ 封面设计/赵 会

我歌颂肉体： 因为它是大树的根

——穆旦

这是革命的时代，这是解放的时代，

这是寓言的时代，这是反讽的时代

——作者

ISBN 978-7-311-02944-9



9 787311 029449 >

定价：12.00元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学术丛书

张天佑 著

革命文化的寓言

——20世纪文学中的身体、死亡叙说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文化的寓言:20 世纪文学中的身体、死亡叙说/
张天佑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311-02944-9

I. 革... II. 张...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426 号

革命文化的寓言

张天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978-7-311-02944-9

定价:1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出版说明

西北民族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民族大学,50多年来,秉承“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突出特色,服务民族”的办学宗旨,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巩固提高基础学科,着力突出特色学科,大力发展应用学科、高新技术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形成了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特别是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和布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交流学校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与特色,现以丛书形式反映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以期得到学界的赐教。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学术丛书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金雅声

副主任:赵德安 郭郁烈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马国柱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洪志	马国柱	尹伟先	牛 锋	王彦斌
何 焯	杨具田	金雅声	赵德安	贺卫光
郭郁烈	林 斌	曹 纯	谢玉杰	斯琴孟和

序

这是一本初看有些“异样”而实则很有创意的书。当张天佑君送上他的《革命文化的寓言——20 世纪文学中的身体、死亡叙说》的文稿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从书名到章节目录,它不是寻常文学批评的体例和格式,甚至不符合一般的写作规范。首先跳入你眼帘的是“葵花”和“太阳”、“飞蛾”和“灯”、“松柏”和“散木”、“月亮”和“阳光”、“地主的女儿”以及“召唤”、“献身”、“冥葬与合葬”等等互不相干的意象,还有“革命生产意义”、“革命的阶级塑形”、“身体的乌托邦归途”等概念,几乎使你不知所云。然而,当细读之后,你才会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这就是,它选择了一些很特殊而我们又比较熟悉的 20 世纪文学文本现象,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借鉴其它批评理论,构成作者自己的批评视阈和范围,其目的就是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时代的精神动向。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所要表达的是他对 20 世纪的理解,对 20 世纪各类文学文本的解读。那些似乎互不连贯的意象,或者曾经发生的文化现象,是 20 世纪(特别是某些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集体无意识的表征。这时你会意识到,它的“异样”原本来自现实历史中的“异样”。所以,读者在读它的时候,大概不能循着一般的阅读习惯,按部就班地看他四乎八稳的解释,而要把握住作者的这种目的和思维逻辑以及他的叙述方式。

这是一本初看“散乱”而实则具有整体观的书。进入本书的阅读过程,你会有内容很“散乱”的感觉。这里既有对自然物象的科学论证(比如对向日葵、松树等的知识介绍,对其本意和引申意义的解释),有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比如对现代和当代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文本的细读

和情节剖析),也有对历史文化现象的引经据典(比如古代文献考证和诗词的运用),还有对社会现象和群体心理的大胆推测(如“文革”中的文化现象的分析),等等。这种现象表明,作者可能在光怪陆离、互不搭界的现象中看到了某些相通性、共同点,他在寻求揭示它们的契合点,挖掘出它们的整体深层意蕴。作者正是从“散乱”的文学和历史的“碎片”中见出了整体倾向,以“革命”和“身体”为中心话题,研究 20 世纪文学对这两个概念的叙述以及在 20 世纪人的生活中的意义。于是,这“散乱”也就散而不乱,它是一种开阔的视野,同时获得了“远观”的距离感,反思的意识也就渗透其中。在方法上,作者较多地运用了原型批评的观点和视角,对 20 世纪的一些文学和文化现象进行了原型溯源,揭示了现象背后深层的象征寓意和文化心理。关于原型,我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一个特定时期文学原型的历史性的置换变形,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一个民族和国家精神的整体性转换生成和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情感倾向的嬗变。在天佑的著作中,我看到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成功描述和深刻揭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原型批评涉及书面文本的研究较多,对社会文化现象研究较少,对传统经典文本研究较多,对当代文学和心理现象研究较少的局面。

这是一本初看信手拈来实则认真思考的书。由于有前述初看本书时产生的感觉,随之而来也会产生“随意性”很强的感觉,似乎信手拈来,随意点染,不假思索。其实,作者特别注意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具体现象描述与实证分析的结合,思考是严肃和深入的。比如作者对那些原型意象在不同年代和时代环境中的象征含义的揭示,主要并不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而在文化心理层面,在心理结构层面。如:“也许用向日葵抒发情爱和象征崇拜在结构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特别是在爱情中,爱和被爱之间所渗透的自卑与顺从、献身与忠诚更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是,这只是异质同构。或者说,向日葵所追

随的太阳由神到人的降格,使向日葵和对象之间,通过情爱的方式缓解甚至消除了人民——忠顺型的非人的虚浮状态,而呈现出对生命、情爱的肯定。这确实使向日葵的文化属性得到了新的发掘,新的概念内涵的介入拓宽了向日葵在诗歌中的表现力,改变了传统文化所赋予的葵意象的发展方向。”这就有不同视角的转换和不同层面的穿透。再比如,通过以树喻人或以人喻树的文学原型研究的角度,选取一些有意味的树的形状来凸现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和生命意识的遭遇及其选择,也是既传统又新颖的探讨。类似的分析,都是穿越了政治、社会层面而深入到文化心理深处,是颇有启发性的。而这种独特的见解散布在字里行间,由此可见,其思考的严肃和认真。

这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不同的读者会品出其中不同的滋味……

程金城

2007.3

目 录

序	程金城
---------	-----

上编 革命生产意义

第一章 朵朵葵花向太阳	(3)
第一节 向日葵的命名	(3)
第二节 20 世纪的向日葵	(5)
第二章 任人言说的飞蛾	(17)
第一节 飞蛾的价值	(17)
第二节 20 世纪的飞蛾	(21)
第三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30)
第一节 散木与松柏	(30)
第二节 20 世纪的树	(36)
第三节 风的方向	(42)
第四章 月亮代表我的心	(51)
第一节 对月:生命意志的张扬与苍白	(51)
第二节 月牙与阳光	(57)
第三节 月亮是爱情烈士的乌托邦	(62)
第五章 有个声音在召唤	(67)
第一节 前面的声音	(67)
第二节 别样的召唤	(71)

中编 革命的阶级塑形

第六章 献身的尴尬	(81)
第一节 革命需要献身	(81)
第二节 贞贞	(87)

第三节	一品红	(95)
第四节	小臭子	(100)
第五节	表演革命	(108)
第七章	遭遇阶级	(112)
第一节	革命/阶级的审美标准	(114)
第二节	让她们走到革命道路上来	(120)
第三节	美属于无产阶级	(125)
第八章	地主的女儿	(134)
第一节	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134)
第二节	美人计	(136)
第三节	还是美人计	(144)
第四节	翻身乐	(149)
第九章	由组织出面	(154)
第一节	奉组织的命令	(154)
第二节	革命胜利了	(167)

下编 身体的乌托邦归途

第十章	冥婚与合葬	(177)
第一节	谁家求合葬	(177)
第二节	被合葬的革命者	(182)
第三节	不朽的身体	(188)
第十一章	另类的合葬	(193)
第一节	没有爱情	(194)
第二节	为了合葬	(201)
后记		(213)

上
编

革命生产意义



100

第一章 朵朵葵花向太阳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李有源

第一节 向日葵的命名

向日葵,原产于美洲。最早见于汉语记载的是1621年明末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西番葵,茎如竹,高丈余,叶似葵而大,花托圆二三尺,如莲房而扁,花黄色,子如荦(蓖)麻子而扁”。成书于1688年的《花镜》始称“向日葵”:“每于顶生一花,黄瓣大心,其形如盘,随太阳回转。如日东升,则花朝东;日中则花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清人陈大章又称“大黄葵”,他说:“大黄葵,独花向日葵也”^①。民间称谓颇多,最典型的如“日头花”、“磨盘花”、“摇头花”、“向阳花”,像阜平民歌:“日头花,圆溜溜,朵朵花儿朝日头”^②;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流行歌曲“公社是个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向阳开呀,花开磨盘大”等。最常见的称谓则是“葵花”,如曾经广为流传的藏族民歌《朵朵葵花向太阳》“朵朵葵花向太阳/婴儿偎着亲生娘/鱼儿离不开河水/藏民永远跟着共产党”^③。向日葵在西语中的命名也与太阳有关,一般都为“太阳花”、“太阳草”等,但没有“葵”和“向”之意。我国在对其命名过程中把它与形状相异且属锦葵科的古葵菜相搭界,表面原因是前者的叶和后者的花皆向日,但其文化指向却与文化专制以及中国文化的阴柔性格有关。葵,最早见于《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前引陈大章《诗传名物

① 《诗传名物集览·卷9》P236

② 《晋察冀诗选》P16

③ 《诗刊》,1958年第11期P30

集览·卷9》如是说:“《朱传》:葵,菜名……大茎小叶,花黄紫色可茹……葵生叶向日,不令照其根。”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太阳,虽不为回光,然向之者诚也。”《左传·七月》:“别鲍牵。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在此,葵的文化意义有二:一是以自卑为前提的下对上的忠诚。陈大章引曹植《求通亲亲表》的后一句是:“臣窃自比葵藿”^①,此意在以后被借之于向日葵并广为引用,如“葵倾”、“葵心”,名句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五百字》:“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二是孔子赋予的智慧、勇敢之意,此意却一直被遗忘、遮蔽,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又出现。

笔者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向日葵的诗歌是清代金农(1687~1764)的《自度曲·黄葵花》:“秋在花枝上,花枝随转,偏向着朝阳夕阳。玉人最爱新凉,靛微黄。风前小病,病也何妨”^②。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将乐府诗《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中的“葵”释为向日葵,显然有误^③。明代的山歌《葵花》:“姐儿好像蜀葵能,胸中一片是丹诚。姐道郎呀,我捉你当子天上日头一心只对子你,你没要阴晴无准弗照阿奴心(捉:把。能:形象,样子。吴地方言)”^④。明钱士升《葵花》:“太阳曾是私自照,唯有兹物感久恩。日暮秋风惨淡里,依依犹欲送黄昏。”^⑤以及孔尚任的《桃花扇》:“慰三军没别法,许就粮喧声才罢,谁知俺一片葵倾向日花。”“黄开金裹叶,红绽火烧花。蒲剑何须试,葵心未肯差。”^⑥笔者寡闻,在元、明、清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集中很少见到有关向日葵或葵菜的诗歌,如今人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共选包括民国在内的词8260首,只有一首曹枕的《满庭芳·葵花》属此类。显然,自元以来随着葵菜在餐桌上的退出,其现实的文化价值也消失殆尽,但此时段向日葵还并没有全面代替葵菜的文化价值。从上引的诗歌来看,向日葵更多的是在表达男女感情上使用,直到20世纪

① 《昭明文选》P44

② 《中华曲综》P383

③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P406

④ 《曲苑观止》P599

⑤ 《历朝花间咏物诗选》P160

⑥ 《中国古代十大悲剧集》P809

30年代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其文化价值才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而对它使用程度之高、之广,足以使其成为20世纪的“花王”。

弗莱说:“诗歌的意义或定式只不过是具有概念内涵的意象结构,”可见意象在诗歌中的地位。按弗莱的观点,意象是“一种艺术形式单位,是带有以自然体为内容的一种象征。”^①而意象的来源在实质上也就是诗人把对于社会、自然的 attitude 在一些具有和这态度的某方面相似的事物(也包括文化现象)身上的投射。当然相似也只是主观上的,它受制于时代、环境、情感、知识,更受制于意象的传统制约。一句话,它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体现者。也许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诗歌意象。特别是某些植物一经赋予意义并被社会认可之后,便广为流传,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特别的“概念内涵”。而一旦支撑其流传的社会被变革或其物种消失,该意象便失去活力,甚至消失。诗歌意象就像植物一样需要合适的土壤,也像产品一样需要市场。古葵菜作为诗歌意象的命运即如是。另外,从意象的生成来说,它从最初的提出到众多诗人的参与和社会的认可、流通,便意味着对其“意象结构”的定型。而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对定型后的“意象结构”的修正、甚至是否定,又扩大了该意象的“概念内涵”,也意味着其“意象结构”的成熟化。向日葵意象的变化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规律。

第二节 20世纪的向日葵

20世纪向日葵作为诗歌意象的文化内涵可分为三类:人民——忠顺型,古葵意象的套用;恋人——情爱型,古葵意象的修正;自我——现代型,现代意识的扩张。

向日葵金黄的花盘,对太阳非常明显的依赖属性,很容易使人把它

^① 《批评的剖析》P471

镶嵌在神一人的模式中。我们知道神一人的模式是太阳一人的图腾崇拜的变体,而这一变体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也包括大部分时段、大部分人的世俗生活)中,太阳或者神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象征。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袖品格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信念越来越多地获得了民众的崇拜之情,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在其表现形式上绝不亚于远古民众的图腾崇拜仪式,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把毛泽东同志和太阳联系起来的最著名的民歌是《东方红》,但“东方红,太阳升”也可以理解为信天游的比兴手法,而非实指毛泽东。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的人才长得好”,山丹丹并不实指香香。由此 1939 年刘御的《延安短歌·毛泽东》所唱的:“太阳出来一点红,中国有个毛泽东。”但并不是直接的比附。而 1941 年朱于奇《杨家岭出太阳》则进行了直接的比附,其副标题是“——献给毛泽东”,并有注“杨家岭是毛主席在延安的住处”。现摘录如下:“杨家岭出太阳/闪闪阳光照四方……”从此,太阳意象失去了其文化的多义性,仅成为一个符号: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就是共产党。不再是比兴,而是定义。例证是 1958 年的民歌运动中,对于太阳意象的运用出现了歧义,如“牛鞭打醒红太阳,红红的太阳放光明”。特别是吕进的“太阳,太阳/你别猖狂/一锄把你挖下来/烘干我的湿衣裳。”但很快就用政治的形式进行了统一,这是图腾崇拜中的禁忌现象的重演。而当太阳成为单一的文化符号时,其全部品格也只能是温暖、光明、伟大等领袖品格,其自然属性中的炎热、日落以及黑于现象却被有意遮蔽。我们很难在这一时段的诗作中看到有关羿射九日、烈日炎炎等主题,因为这些自然属性在文化意义的政治性比附中意味着残酷、死亡等,与民众对图腾的心理期望定势差距太大。

但是,在对毛泽东崇拜的高峰期——六七十年代,“太阳=毛泽东”的比附在诗歌创作中反倒减少。原因可能在于:太阳的文化符号已老幼皆知,无法满足诗歌创作的要求,而诗人既不敢也无力对之改写,只好弃置不用。本来,在传统诗歌中也一直是用太阳象征皇帝的,对皇帝的忠诚也确实传统文化所赞扬的美德之一,不贰臣是臣子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都可适用于瞿秋白对